



【拒绝流行】曹林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教授

硬刚恶意举报

从前段时间“复旦副教授沈奕斐被小学生家长举报”引发的舆论反应看,舆论和公众对那种滥用举报损害教师权益的行为,已经深恶痛绝。正当举报应受尊重,但恶意污名不可接受,评论区一边倒对沈老师硬刚和复旦应对的支持,便是这种舆论水温的体现。

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大小中小学,再到主流舆论,都在给老师撑腰,为什么很多老师仍感无力?问题在于,还须破除以下两个障碍,在舆论和制度层面为老师创造包容的环境。

其一,以消费思维看待教育关系的观念障碍。很多人习惯于将市场那套思维照搬到教育关系中,觉得送孩子接受教育,自己是消费者,而学校和老师是“服务提供者”——既然我是消费者,你就得满足我的各种需求,哪怕它是苛刻的、无理的、超出可满足限度的。这种关系认知下,“信不信我投诉你”这种消费场景中的施压逻辑就会挂在嘴上。实际上,绝不能市场化那套逻辑来看待教育,教育关系是一种信托关系,信任与托付,信任老师,把孩子托付给老师,这个过程需要保持对育人者的信赖,信赖老师对孩子的良善用心与公正判断。不在观念上理清这种关系,消费的优越感自然会滋生出滥用举报的戾气。

其二,“举报代表正义、被举报身陷污名”的结构障碍。这是一种结构性不对称的打击,举报成本近乎为零,打几个电话,发几封邮件,就可以完成,无须精准与穷尽举证。而被举报者则陷入无穷无尽的麻烦,污名之下承受沉重的精神压力,不得不疲于应对各种举证。打破这种障碍,需要为举报设置门槛,课以举证责任,并让诬告者付出沉重的代价。其实问题很多时候不在举报的家长,更在缺乏原则担当的学校,如果学校能够贯彻举证倒置,有处置问题的事实自信和法规自信,老师也不至于被程序所拖累。



【喧嚣之余】宋明辉 美国韦尔斯利学院讲座教授

地中海的风

荷马史诗里写到地中海,总会说那是酒色之海。早春阴雨天气下,在希腊海岛上看到的海水,确实是酒红色。但荷马史诗没有写地中海的风——是橄榄树的形状。

希腊土地贫瘠,暗绿色的橄榄树配着褐色的土壤,如果不是阳光普照,确实并不让人觉得赏心悦目。但只要你站一会儿,听着风吹来,吹过周遭那些巨大的废墟,像古老的幽灵在呼应风声。把目光收到眼前,一丛一丛橄榄树都在风中摇曳。

走到卫城是个爬坡的过程。一路上风越来越大,到了卫城的位置,四处看雅典的风,风是橄榄树的形状。这里经历过雅典鼎盛时期的扩建,罗马帝国时期的重修,据说那些在岁月中蚀花的石头上,过去都曾经有高大的神像,或是骑马的将军。雅典娜神庙如今依然是最大的神庙,据说古代时候有五米高的彩色雅典娜像。石柱都有讲究,而石柱顶层有一圈雕塑,一面是雅典娜的诞生,一面是特洛伊战争,这些雕塑残片如今都在卫城博物馆。

石柱屋顶下的一圈,也都是连贯的浮雕。石柱外圈的顶上则是有些戏谑色彩的人类与卡戎之战。如今屋顶下只有石柱,石柱里面也只有石柱,所有装饰都不见了。

风吹过这相当辽阔的一片废墟,只有橄榄树枝在摇动——从两千年前吹来地中海上的风,是橄榄树的形状。

● 随手拍 广州傍晚 图采斌 文采越



【梅川随感】陈子善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

“得书记”成书记

自2012年1月5日起,我在自己的手机微博上开设了一个不定期的“得书记”专栏。正如专栏名所示,“得书记”专记我所得的各种中文书,也包括少量外文书,不外乎我所从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方面的旧架新籍,也有我认为值得推介的其他人文社科书刊,间或也扩大到手稿、信札、字幅、藏书票、纪念邮票、贺年卡等与书直接间接相关的文字。

《得书记》一书即我2012年至2025年所作“得书记”的汇集。当年微博字数有所限定,所以我的“得书记”开始也限定在每则130字之内,常有言犹未尽之感;后来才逐步扩大至三四百字,可谓一册小书话了。

出乎我意料的是,“得书记”曾受到广大微博朋友的欢迎。上海《文学报》“作家生活”版,还曾数次选刊“得书记”,2013年3月28日该报首次选刊《得书记》时称其“史料价值与学养趣味相得益彰”,这当然是我努力的方向。还有一位年轻学子以“得书记”作为他的学位论文的题目,并汇集2012—2014年的“得书记”成册,一共才两本,一本赠我,我至今珍藏。

“得书记”是我对感兴趣的书的所思所感所忆,开始写得很起劲,甚至一天一册,近年来则间隔时间有长有短了。但交流信息、保存史料、略抒己见的初衷始终不变。



【星花的话】尤今 新加坡作家

“虎寡妇”

根据非官方的估计,孟加拉广袤的红树林区内,聚居着三千多名“虎寡妇”——村中男子以采蜜与砍柴为生,常年进入虎患严重的森林而不幸遇难,留下的孀妻就被称为“虎寡妇”。

现年五十的帕鲁比尔就是其中一名虎寡妇,当她向我们忆述当年时,语调依然透着沉重的哀伤。某个清晨,她的丈夫卡利波多与两名村民结伴,划船顺着支流进入森林砍柴。工作了五个小时后,他们将几大袋木柴拖到河边,然而,遇到退潮,船只无法行驶,只能静待涨潮。卡利波多不愿枯等,独自折返森林拾柴。过了不久,岸边那两人忽然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虎啸,立刻知道大祸临头了。他们冲进森林,正好看见猛虎叼着鲜血淋漓的卡利波多走向深处……他死时五十五岁。

帕鲁比尔成为“虎寡妇”那年,才三十五岁。

丧夫之痛犹如万箭穿心,与此同时,她还必须承受村人的冷眼、蔑视、嘲讽与疏离,因为根据村庄古老的传统信念,男人如遭虎噬,一般人都认为是妻子带给他的厄运——“虎寡妇”这三个字本身就带着歧视的烙印。

丧夫之痛或许会随时间流走而缓慢愈合,但被视为“不祥”而终身遭人排斥的痛苦,却像潜伏在血液里的毒瘤,永远割除了。

“我是为了孩子才活下去的。”她说,眼神如同一口枯井。



【不知不觉】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执行主编

遇到玛丽亚

漫长的人生中,许多的人呼啸而来,相遇和离别,但被记忆清洗过后,留存下来的刻痕,其实与彼此相处的时间与次数并没有太多关系。比如我记忆里的玛丽亚·戈塔多——一位意大利汉学家。

1982年,在复旦中文系读大二的我和班级里多位女生,去“陪住”留学生。我的同屋是美丽的路易莎,寒冷的冬季她总是一袭大衣配长靴与格子裙,她研究敦煌变文,柜子里储存着花色繁多的来自意大利的各种面条。她告诉我,意大利的咖啡豆不一定有名气,但喝咖啡的方式很有名。而我同学陈萍的同屋是来自威尼斯的玛丽亚,她和日本留学生Tomohiko谈恋爱,彼此只能讲中文……

几十年过去,2020年,在上海作家协会爱神花园的我的办公室里,很惊喜地与玛丽亚和她的日本先生相聚。1998年以后,除了在大学教书,她专心致力于将现代中国文学翻译为意大利语。她也谈到了为了翻译毕飞宇的《推拿》,还原小说中对盲人推拿师细腻、真实的人性刻画,她特地到南京体验生活,这部书被意大利学界评价为“高度成功、精准传神”。那时,她已经翻译过老舍的《骆驼祥子》,张爱玲的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及《倾城之恋》,苏童、余华、王安忆等大量作家作品。2023年初,玛丽亚请我帮她联系钱钟书《围城》的版权,说有个大出版社蒙达多里(Mondadori)想翻译,我拜托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朋友找到他们对外部同事,解决了授权。

我以为,有一天,我会有机会在意大利遇到玛丽亚,跟着去她的故乡品尝美食,但我忽然收到陈萍发来的照片,照片上的玛丽亚在家中的沙发上坐着,瘦削,眼睛凝视着镜头,旁边是她的先生和两个儿子。陈萍说,此时病中的她已经很少开口。然后,4月,在一张追思会的流程表里,我知道,她离开了。



【夕花朝拾】杨卓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

吴敬梓的肺腑之言

安徽全椒与所有县城一样,也有一条商业街,一个儒林宴,还有一条儒林大道。直到去了吴敬梓的故居,我才琢磨出全椒的旧貌。

吴敬梓家的遗园在县城外北面,与堂兄家隔着一道水,过水一般走拖板桥。大水来的时候,拖板桥会被淹没。全椒县城在南面,很小。文庙已经看不见了,但奎光阁还在。下面拦着标条,但我们还是大着胆子从下面走了一遭。

总之,这里曾是战略要地,兵家必争之处。遗园被太平军轰毁过,只有一间耳房存留。在废墟上捡了两个瓷片,作为纪念。

在看吴敬梓纪念馆的展陈时,我时时想到鲁迅的祖父,也是这种乖张而倔强的性格,经常“呆皇帝”“昏太后”地叫。清明的时候,他也会像吴敬梓著《诗说》一样,为子孙们写下必读的遗书。世上有一种人叫“畸人”,大概这两位都是。

对全椒环境的无可忍受,终于让吴敬梓毅然决然地在三十三岁搬到了南京。在与全椒几个《儒林外史》的爱好者讨论时,我提出了庄秋水心心念念的这个概念:“到大邦去。”

《儒林外史》里最出名的“大邦”,是姜夔文对杜少卿说的:“你眼里又没有官长,又没有本家,这地方也难住。南京是个大邦,你的才情到那里去,或者还遇着个知己,做出些事业来。”这一段话,可能是别人劝说的,但肯定最后化为了吴敬梓的肺腑之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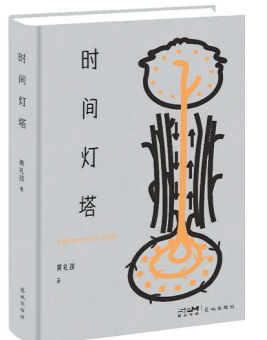
在肖复兴的“老街”里读懂北京人

□施战军

【微观

□张定浩

“自然不需要比喻”



对故乡的印象,是每个人最鲜明的记忆。我小时候在科尔沁草原,早晨醒来,听见牛叫和大鸟的叫声,晨光打在脸上,看见沙丘上颤动的气流——那是我第一次打量世界。从那以后,我读到荒野、草原、北大荒的场景,浑身毛孔就张开。这里其实有一条朴素的阅读经验:好的文字,能唤醒读者自身的生命记忆。

老街对肖复兴先生来说也是一样,他的新书《老街》写的是北京的西打磨厂一带。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以后,我们见过很多关于北京的读物。从文学作品的角度看,如实地道出自己在北京生活的经历、感受、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,特别是这种非常实在的、质朴的、深情的写作,这部《老街》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好的。

读这本书,最突出的感觉是:对于

读者来说,一个作家之所以亲切又高级,是因为他对笔下的每一个生命都有体恤之心。不管这个人好还是不好,首先得体恤他(她),才能把他(她)写活。肖复兴先生就有这个特点。他写他们的窘迫、自私、软弱,也写他们的仗义、坚韧、体面。我想起托尔斯泰、雨果、屠格涅夫、契诃夫,他们就是这样对待生命世界的。后来,我们对生命的态度出现二元对立,对恒久性的认知动摇了。但有些人还是能从前辈作家的写作里,体悟到良苦用心。

《老街》写了西打磨厂从明清到当下的漫长变迁,但肖复兴的着力点不在地理考证,而在人。他写粤东会馆里那些房客:被从三间正房撵进过道小屋的毕家老七,一辈子伺候瘫痪儿媳的丁老太太,从和平饭店搬到粤东会馆只为能晒到太阳的评剧演员冯老太太……他不把这些人物写成苦难史的符号,也不写成励志故事的标本,他就是写一个人怎么活,怎么死,怎么爱,怎么恨,怎么在时代的大潮里被推来搡去,却还保留着一点自己的东西。这种写法,需要作家放下审判的笔。丁老太太的孙子淘气儿在母亲瘫痪时,把伺候的活儿全甩给奶奶,肖复兴写他不愿意,但也没有把他写成坏人——他只是在那个年纪,那种境况里做了一个普通人的选择。这种分寸感,一定是深受老北京的浸润,也一定还深得托翁、老舍等人经典作品的真传。还有同泰店里,那些“扛大个”的、拉排子车的,作家写他们怎么在混乱年代里替别人的房,写他们怎么在事后又动了恻隐之心——他没

有站在道德高地上批判,而是把他们当作和自己一样在时代里挣扎的人来写。这种写作立场,不是技巧问题,是心性问题。

老北京人的北京,和外来户的北京不一样。鲁迅、周作人、郁达夫、林语堂都写过北京,但他们毕竟并非土生土长。老舍不一样,他写济南,你感觉他还是在写北平;他写河北的一个小镇,你还是觉得他在写北京。看《四世同堂》,一个小胡同,一个小院子,跟肖复兴写的老院、老街,是一个精神血脉。都爱北京,最爱的是平民生活。老舍的价值观念,通俗讲就是:谁搅乱老百姓的安宁,谁就是王八蛋。肖先生也是这样,但他更愿意去发现在生活不安宁的时候,那些努力寻求安宁的生命力量。

这个区别,我以为是理解《老街》的关键。肖复兴写动荡——写粤东会馆里那些被赶出房子的人,写“上山下乡”运动中一家子女离散各处的家庭——但他把笔墨落在那些缝隙里残存的东西:梁兆被赶进同泰店的门房,照样在院子里拉胡琴唱戏;老孙头儿被批斗完了,照样种他的美人蕉。作者不是要美化苦难,而是要写出人在苦难中,仍然不肯丢弃的那点体面。那点体面,就是老舍要的“老百姓的安宁”,也是肖复兴的“努力寻求安宁的生命力量”。

写打槐花那一段,我印象很深。1960年前后闹饥荒,恒记药店收购槐花入药,老街上的孩子们半夜跑到东交民巷去打槐花,晒干卖了换粮票。肖复兴写小萍趴在装槐花的麻袋上睡着

了,“在街灯凄清如霜的灯光下,在落满一地纷乱如雪的槐花中,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”。他让你看见一个孩子在饥饿中仍然保有的东西,一种活着本能的、不声张的韧性。丁老太太伺候瘫痪儿媳几十年,儿媳死后,她坐在门口一声不吭,像木头人。小萍跑去用扇子赶苍蝇,又买来香菜撒在尸体上。肖复兴写丁老太太“心里存着遗憾,到了也没能让儿媳说了话,哪怕能够说一句话呢”。这就是他说的“尊严被一点一点消磨”,不是轰轰烈烈的悲剧,是日常的、沉默的、一点一点被磨损掉的东西。但肖复兴把它写出来了,让读者看见了。这种看见,本身就是一种体恤。

肖老师还是个资深乐迷。他写过《最后的海菲兹》,写小提琴家海菲兹的故事。我上世纪九十年代买过那本书,学着写音乐笔记也是从那儿开始的。他写一个人,往往从一个细节切入,然后慢慢展开,中间穿插回忆和背景,最后收在一个安静的画面上。比如写何半仙,先写他正骨的手艺,再写他和“白薯脚”老婆的婚事,再写他算卦的轶事,最后收在“文革”开始前就带着老婆回了东北农村”上。整个叙述像一首慢板,不急不躁,但每一个音符都落在该落的地方。

书里的北京话用得也好。“好家伙”“得”“小伙子来了个大窝脖儿”“这点儿钱,连添只蛤蟆添点儿力都谈不上,就是一点儿心意”。这些话跟那条街相匹配。这种话,不是采风能采到的,是在那条街上活了几十年,听熟了、长在身体里的。方言和口语在这本书里不是装饰性的地方色彩,而是人物的血肉。一个人怎么说话的,就是怎么活着的。肖复兴深谙此理。

作家在后记里说,他为了写这本书,二十多年反复回老街,和老街坊聊天,请他们指认旧址,核实细节。这种写作方式,在今天已经很少见了。多数人写老街,是把它当作一种文化符号来书写,是怀旧和乡愁的文学消费品。但肖复兴不是,他是把老街当作一个活的生命体来对待——它有呼吸,有心跳,有自己的记忆和遗忘。他写的不是逝去的老北京,而是在拆迁和新修的缝隙里仍然活着的那条街、那些人。那些人的搬走了,有的过世了,有的还在。但他们在肖复兴的笔下,都获得了一种文字的生命。

故园是地理,故家是情感,故乡是命运。《老街》容纳了这三重意蕴,写得很质朴,但有深情,有对人生哲学的深入思考。读这本书,不光是读一个人的回忆,更是读一条街的活态。从这条老街,能读懂北京人,也能读懂中国人里最优秀的那一部分。一个一个人物走过来,老一辈北京人身上的品行和情义,能不能传给年轻一代?年轻一代读了,看看这些东西还在不在自己身上。如果还在,北京就是活的,就是永远有力量的。

书里的北京话用得也好。“好家伙”

